



胡志偉牧師，香港播道神學院神學學士；加拿大維真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。現任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，宣道會元基堂及天頌堂顧問牧師、監察賭風聯盟召集人、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委員。編著《禱聲不絕》、《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》、《轉變中的成長》、《一派胡言》等。

# 受人誤解的加爾文(上)

◎胡志偉

——〇〇九年七月十日是約翰加爾文誕辰五百週年，——全球各地均有甚多研討會、講座或聚會等紀念這位宗教改革先賢。加爾文不僅屬於改革宗教會，也是屬於大公教會；無論是信仰保守或前衛、主流教會或獨立堂會，均深感這位巨人對整個基督教會的影響；他信仰的影響力同樣具體展示於社會及文化之內。就筆者所知，本港唯一紀念加爾文的宗派，只有中華基督教會；本地神學界有關加爾文的講座或研討會，尚未聽聞。相對之下，印尼有唐崇榮的國際歸正團契舉行「加爾文誕辰五百週年紀念神學研討會」（三月廿四至廿九日），台灣也有多場紀念崇拜與研討會等，較本地熱鬧得多！

查實加爾文的神學對華人與本港教會有深遠的影響，華人福音派的信仰傳承肯定來自加爾文的思想多於來自馬丁路德。除了聖公宗、信義宗、循道宗之外，浸信宗、長老宗、福音堂、聚會所等無不傳承自加爾文。就以宣道會為例，宣道會創辦人宣信（A.B. Simpson）來自長老宗，其主要思想來自改革宗成分多於來自衛斯理與「聖潔運動」。筆者曾於主日崇拜中，問過百會眾中有誰聽過加爾文名字的，只有不過十位舉手；我笑曰：「你們聽過 Calvin Klein 多過 John Calvin！」會眾的「基督教通識盲」正是我們要承認與面對的。

不少教牧與信徒對加爾文存有不少先入為主的誤解，過往大多從《基督教要義》（*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*）來理解加爾文，或受歷史教科書偏差的判斷，認為他是以宗教霸權來治理日內瓦，標籤他是「獨裁者」，一心建立所謂「神治政權」。近十年來，隨著加爾文研究增多，學者回到加爾文的註釋、講章與著作等重新發掘，更為完整與全面整理加爾文的真實面貌。

世界歸正教會聯盟（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）紀念加爾文五百週年發表的聲明說得好：「我們不要創造崇拜加爾文個人的教派，甚至高舉他為完美的聖人，這樣做根本違反改革宗基督徒播下的道種，就是反對推廣任何個人崇拜。加爾文本人強調『惟有神配得榮耀』（*Soli Deo Gloria*）！」筆者撰寫此文，期盼引發更多教牧與信徒一起從這位更正教偉人，不單領受其信仰傳承，更重要是學做加爾文如何把信仰落實於世俗化的城市生活中。

## 城市漂流

近年來，就加爾文生平與思想的研究著作陸續出版，其中有荷蘭教會歷史學者 Herman Selderhuis 撰寫的 *John Calvin: A Pilgrim's Life* (IVP Academic, 2009) 及 Robert Godfrey 的 *John Calvin: Pilgrim and Pastor* (Crossway, 2009)。兩位作者不約而同，以「漂流者」(pilgrim, 或可譯作天路客) 指向加爾文的一生。

加爾文出生於法國皮卡第省的主教城諾陽（或譯努瓦永，Noyon），父親原著意他將來於堂會出任聖職，但由於與堂會發生衝突，加爾文就由讀神學改為唸法律。加爾文曾生活於不同城市：巴黎、奧爾良、巴賽爾、日內瓦、斯特拉斯堡等地。一五三四年，他離開了家鄉，因著反對羅馬教廷而

……作為使命先行者，加爾文一生是追求上帝的榮耀，這正是當今教牧有時失掉的，因為我們重視個人或組織的成功多於關切上帝應得的榮耀。倘若所有教牧關切的皆是上帝的榮耀，我們的教會與社會將會呈現哪種願景？

被逼過著流亡生活。

終其一生，他以「異鄉人」牧者的身分，牧養著同樣顛沛流離、離開家園的信徒，無論是斯特拉斯堡的法國難民教會（一五三八至四一年）或日內瓦的「聖彼得座堂」（St. Peter's Cathedral, 一五三六至三八年、一五四一至六四年）。他後來回憶：「上帝如此帶領我，祂通過不斷改變的情形使我不得安頓在一個地方……」（Thea B. Van Halsema 《加爾文傳》，頁 32）。

劉再復於《面壁沉思錄》所言：「漂泊者對自身的內心呼喚是『走出去』和『走進去』。『走出去』是走出國界去拓展另一片天地。不是侵佔他人他族的領土，而是開拓永遠屬於自身的人文世界。」（128 頁）加爾文提及亞伯拉罕蒙耶和華呼召走出去時，不禁表露：「放逐本身是痛苦的，而他們鄉土的甜美使全人類連結在一起。」（引自 William Bouwsma, *John Calvin - A Sixteenth Century Portrait*, 頁 16）。加爾文雖不能植根法國，漂流的生活沒有削減他服事的心志；無論他身在何方，加爾文知道重要是順服神的主權，忠心以聖道與聖禮來牧養會眾。

城市一向扮演著人口集散的角，不斷有新移民湧入，也有不同人等因著貿易及其它因素移居外地。全球化帶來城市的「流動人口」愈來愈多，教牧也需要有加爾文一樣的牧者胸懷，敏銳城市漂流者的靈性需要，無論是遷入的陌生人、或是於外地謀生的會眾，也能成提供適切的牧養與關懷。克特金（Joel Kotkin）於《城市的歷史》（*The City - a Global History*）指出任何城市皆要發揮三重角色：神聖、安全與繁榮之地。教會於當今物質化城市，其中重要功能之一正是成為「漂流心靈」可以憩息的神聖空間。教會不要失掉其神聖身分，它不要扮作宗教消費品的代理商，而是讓眾多城市「靈性漂流者」（spiritual pilgrims）可安身之所。加爾文的信息，能餵養日內瓦會眾的靈性飢渴；我們得反思教會領袖對城市資訊與技術的掌握多了，然而「滿足心靈」的「道」卻少了！

## 使命塑造

加爾文經歷了靈性的「奇妙轉變」（推測是一五三二至三四年期間），「上帝突然降服了我，改變了我的心，我即刻之間燃起強烈的願望，要在真道上長進。」（《詩篇註釋》序言）加爾文重視個人與神之間關係，肯定基督十架救恩的必要，但他並沒有把信仰「私有化」，他理解福音使命是普世性。不少人誤會加爾文的「預定論」等同毋須傳福音，其實是後人偏

差的理解與應用，加爾文肯定福音使命的重要：「正因為我們不知道誰屬於預定，或誰不屬於預定得救的人數當中，所以我們當熱烈地盼望一切人的拯救。我們所遇到的無論是誰，都當努力使他分享平安。」（《基督教要義》卷三第廿三章 14 段）

瑞士日內瓦成為逃避宗教衝突的避難城市，大量法國及其它地區難民湧入，一五五〇至六〇年人口激增一倍。日內瓦原居民與法國新移民，兩個族群對宗教改革存有極為相異的期望，加爾文的牧職就是要不斷化解族群之間矛盾與衝突。基於他的法律知識，加爾文知道「依法治會」，制定適切的教會法則，才能保障宗教自由，如聖職按立或開除會籍等不屬於市議會的權力範圍。加爾文重視秩序，他信奉上帝的護理與管治，一切事物應有規有矩，他竭盡全力就是要本於聖道，撥亂反正，匡復教會和社會，回復上帝的秩序。

加爾文沒有一套現今所謂「宣教神學」，然而他從聖經整理而來的系統神學，導致他不眠不休地為著福音職事勞苦。除了行政與學術之外，加爾文也承擔著沉重的牧職：主日上午他多宣講新約，主日下午是詩篇，而週間則採用舊約。重返日內瓦之後，他講道大約有四千次，平均一年有一百七十篇，他更主持二百七十次婚禮與五十次水禮。

加爾文不是只忙於應付堂會內務，他訓練法國難民要作宣教事工，差派他們回國植堂。改革宗神學院教授 Frank James III 重整有關資料：一五五五年，加爾文與日內瓦於法國植了五間堂會；至一五五九年，建立了一百間；至一五六二年，發展至二千一百五十間。一座二萬人口的城市，居然可以於七年內建立了二千多間堂會，這一切源自加爾文沒有把所謂「神學」與「使命」分割。他更於一五五七年差派兩位宣教士 Pierre Richier 與 William Chartier 前往南美洲巴西。加爾文的日內瓦，成為當時宣教使命的訓練基地與差派動員中心。

加爾文認定他所作的一切，正如他於《答沙杜里多書》（一五三九年）所剖白：「對增進上帝榮耀的熱忱應當超過我們為自己的好處的所有關切之上，哪怕這種好處是永生。」（引自 Halsema 《加爾文傳》）作為使命先行者，加爾文一生是追求上帝的榮耀，這正是當今教牧有時失掉的，因為我們重視個人或組織的成功多於關切上帝應得的榮耀。倘若所有教牧關切的皆是上帝的榮耀，我們的教會與社會將會呈現哪種願景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！（下期續）

（本文內容亦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出版之《使命與領導》分段連載。

網址：<http://leadership.chinesepastor.com/>）